

川沙县文史資料專輯

第 五 期



川沙县政协文史資料組

一九八五年十月

《川沙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川沙县工商史》，在县政协的直接领导下，承工商界人士中年近九旬的元老和年逾花甲的老工商业者以及现在社会主义企业中任职的工商业者的后裔，热忱支持和供稿，经《文史资料组》同志的努力工作，今天出刊了。

我县的《工商史》，是从封建主义的清朝咸丰、宣统年间到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百余年的坎坷历程。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清政府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开放了通商口岸，从而各国帝国主义者犬牙交错踏入我国进行经济侵略，阻遏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国内与封建社会的官商勾结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对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进行明争暗夺；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火洗礼，毁店伤人；日寇还在沦陷区公开设立烟、赌、娼馆，毒害人民，当时坏人当道，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工商业者受尽其蹂躏。正当全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在它崩溃的前夕，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官僚资本发了国难财，而民族工商业者深受其害，市场萧条，民不聊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扶植工商业发展生产。

通过党的爱国守法教育，同时对企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逐步纳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到一九五六年全市工商业者都欢欣鼓舞地参加了公私合营。根据党对工商业者的方针、政策，使之安心学习、安心工作、安心生活，从此朝不保暮的命运一去不

复返了。

经过《工商史》的编写，作者们都以亲身的经历，回忆百余年来各个朝代工商业者的命运，他们共同的结论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我们工商业者的前途。

历史证实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要实业救国只能是梦想。资本主义工商业相互竞争，是推动着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会产生你欺我诈、强食弱肉、两极分化，“富不出三代”。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篇《川沙县工商史》是一篇爱国的工商业者同各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史；又是一篇新兴行业的创业史。

作者们不顾自己的年高体弱，真是白发童心，不辞辛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还追溯到百年前的所见所闻的一事一滴资料搜集，认真核实，倾心把史料编写出来。老牛明知夕阳短，要将余热献给党；要把史料给读者。

《川沙县工商史》只作县政协内部刊物，编写时限于水平，用字不当，言不达意，谬误难免，仅供读者参考，凡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我们谨向热心供稿的单位和作者，致以亲切的谢意。

川沙县政协文史资料组

一九八五年九月

工 商 史 目 录

川沙县粮食市场概况	汪筱云	1
川沙的奶牛发展史	徐根涛等	4
在上川交通公司三十年	顾伯威	9
高桥镇米行业和米业公会的情况	沈人豪等	13
杨思镇米业盛衰概况	杨维清	15
洋泾镇工商业简史	张金中等	18
杨思镇工商业略记	杨维清等	21
杨思地区的养鸡史	邱俊翔	26
川沙毛巾联管史	张水琴	31
川沙网扣花边的发展史	政协文史资料组采访	36
金桥镇工商简史	俞福昌	40
高行镇工商史	黄俊贤	45
新港镇的沿革	陆修澄	49
解放前城厢镇烟纸行业的变化	郑文藻	53
本县特产——高桥松饼	施毓秀	55
宝华棉织厂简史	陶石鑫	58
新中机器脱水厂简史	张建良	60
钱万隆酱园的史志	吴伯鸿	64
解放前酱园业的概况	张金中等	67

川沙县粮食市场概况

一九四七年三月，正当国民党政府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趋向经济危机的时候，川沙县旧商会会长陈炎洲、米业同业公会、川工纱厂（今上棉36厂）康虞尧等发起成立川沙县粮食市场。主持人周秉彝，商会的职员为市场服务员。

到市场来交易的有：大户，德丰公、德顺公、周源昌、瑞余等；中小户，近四十家米商。凡参加市场交易的须一次性交付入会资折合三斗大米的现金，就可以进场交易。每天早上集市约一个多小时。

这个市场实际是投机场所，它的业务是：买进、卖出。市场对行情涨落价格趋势的术语：叫看大（涨）、看小（跌），一般探听周浦米市场的行情。每天集市一开，同业们就议论纷纷，众说不一，有的拿了“样包”（米样）要脱售，成交时讲明现货交易，但大多数只是一张支票，一纸栈单，有的栈单不是卖方本店的，而是另一家米店的栈单。当时各家的栈单数量很多，在粮食市场凭信用流通。

一旦米价“看跌”，“出笼”的多（卖出），有些自己没有实力，借进高利贷（每元日息八分至一角），买进的小户顶不住了只好“忍痛蚀本”出售。尚有消息灵通的米商一知道周浦、上海米市场有下跌的趋势，即在市场“抛出”（卖出），若有回升或上涨的苗头就尽量吃进（买进）。有的米商听到上海、周浦粮价已经涨，而消息不灵通者还不知道上涨那就被灵通者买去，叫“抢帽子”。有一位在川沙开米行，还在上海设有申庄的川沙花米业巨贾，每当星期天亲自到市场来交易，使各家米商都要看他的颜色，能左右川沙花纱粮食市场价格。

有的商人划算花、纱、粮的价值比例：如一石米等于多少小交。

一件纱等于多少石大米，当市场波动而引起的比例差距过大时，如纱涨米跌他们就出纱进米，或米涨纱跌就出米进纱，诸如此类在花、纱、粮食上面动脑筋，翻花样，赚钞票。

上述情况绝大多数成交的商品不是实销量而是借以作为投机买卖的筹码。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败局已定，日暮途穷，钞票的票面越来越大，物价瞬息万变，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老百姓根本不信任货币，如职工工资以大米计算，各工业品、副食品、生活日用品等都以大米计算。

随着粮价的哄抬暴涨，市场一片混乱，升斗市民受尽其苦，早上拿了价值一斗米的工资，下午就买不到一斗米，连一般小商人也受害不浅，今天卖出去，明天补不进。

同年八月，蒋经国来上海实行限价，在政治上施加压力，通货上改头换面发行金圆券限价，企图挽回面临的经济总崩溃。这时川沙县粮食市场的情况同上海和全国的市场一样，到市场来的都抱着观望态度，只是听听市面行情，大家的心理是：按限价每石金圆券十九元八角成交感到肉痛，超越限价又怕受罚。实际上这个市场等于虚设，那时场外交易倒非常活跃，不受限价约束。后来物价实在限不住了，如断了线的风筝无法控制。先是上海的黄金、美钞、股票市场每天涨订板，川沙县粮食市场价格也无休止地上涨，往往有价无货，均在场外交易，这样混乱的市面持续到解放。

一九四九年，川沙解放后，人民政府首先关心人民的生活，就从老解放区等产地调来大批粮食，供应城市居民、农民的口粮。县工商科动员米商恢复粮食市场交易，中粮公司为抑平黑市粮价，在市场挂牌标价，不限数量，供应零售米商。这样货源有了保证，从

此黑市逐渐消失，粮价得到平稳，确保了千家万户的口粮需要，人心安定，广大群众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粮食政策表示衷心拥护。回顾解放三十五年来，我国的粮食价格基本不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万万办不到的。

汪筱云供稿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川沙的奶牛发展史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向英帝国主义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口通商，从而各国帝国主义侵入我国沿海各城市，进行经济侵略。

约在一八七〇年，英商“可的”牛奶公司设在上海，从外国运来奶牛生产牛奶，并雇佣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接着又有荷商的“爱光社”；美商的“红印牌”；日商的“可乐”等牛奶公司陆续开办。

中国官僚买办资本沈九成亦相继开设了“生生”牛奶公司；随之民族工商业永安集团马文甲开办“畜植”牛奶公司；吴法商开办“源源”牛奶公司，这时牛奶生意大为兴旺。

一八九〇年，川沙县白龙港北浜顾家宅（现属合庆乡）有个老农顾华金者，他的好友在荷商的“爱光社”牛奶公司饲养奶牛。当时外商对奶牛的牛群管理极严，绝对不准把奶牛传到中国人手呈，就是淘汰的奶牛也要在屠宰后查验这牛的皮和皮毛花样，防止屠宰时掉包，如违反这个规则者要吃外国官司的。有一天夜里，“爱光社”奶牛场里有一头母牛产下两头公牛（双胞胎难得有的），当时华金的好友见有机可乘，于是将一头公牛上报；另一头公牛^{公牛}外国人都在睡觉时，他就悄悄地将小公牛越出场外，从而转移到顾华金家里饲养，并用耕牛的奶喂之（这公牛是荷兰纯种），待长大后就同当地的耕牛交配，产下来的牛经过提纯复配，到了第五代培养出许多荷兰奶牛。顾华金开始时把产下来的杂交小牛卖到别处去，后来，发觉人家买去的牛以挤奶出售可以多赚钱，这样就有人考虑建造瓦房饲养外国奶牛的打算。

一九〇四年，川沙县有些农民利用冬闲时间，租用浦东沿江一带的船厂、豆芽作场的空房子，将奶牛牵入饲养，挤出来的牛奶装在洋瓶里（啤酒瓶），用箩筐背到上海市城里去卖。英、法租界认为不合卫生要求不准卖的，如被巡捕看到就要捉进去受罚。

经过一冬的牛奶生意，赚了钱，到清明节就连人带牛回乡种田，所以称谓“半农半商”。由于养奶牛生产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因此有些农民弃农而专业养奶牛了。后来有的专业户还依靠教会牌子向法租界当局领取养奶牛的执照，这个执照是通过在法租界领事馆工作的张文彬的关系才给予方便。

最早的一家杨协记牧场是设在杨家渡朱家滩，造起瓦房开了气窗作为牛舍。从此，由专业户发展成为牧场。经营牛奶获利较厚。

一九一〇年，有陈根龙开设生记牧场，全家人都参于养奶牛挤奶出售。

一九一四年，有徐根涛（原十一牧场场长）的祖父徐庆修、父亲徐绍生由川沙老家来浦东专业饲养奶牛，以此营生。在一九二九年，根涛也来参于牧场的勤杂工作。到一九四一年，根涛已成家后，他的父亲分给他夫妇俩两头奶牛作为成家立业之本。几年后，根涛在铁根桥开设了华生牧场，发展到一九四九年已有二十四头奶牛。解放后，到一九五六年，又发展到五十六头奶牛，是在浦东地区合营户中奶牛最多的一户。

一九二九年，张关林在福康路开设中南牧场（关林原是杨协记的工人又是亲戚）。

一九三〇年，又有大中、益利、三友等牧场先后开设。川沙人来浦东杨家渡、陆家渡一带开设牧场的如雨后春笋。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牧场的建设、经营管理、奶牛品种的改良渐趋正规化。

牧场的经营特点：主要是家庭生产方式，以全家人参加工作或少数的亲戚子女参予，雇佣工人者极少。据一九四九年的统计：在二十六户中有从业人员一百七十一人，其中工人七十九人（包括亲戚子女），占从业人员的百分之四十六。由于家庭人员参加劳动，不计工作时间和报酬，所以开支省、勤俭节约、积累资金多，这些有利因素促使生产发展迅速，并敢于同帝国主义的牧场竞争。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沿黄浦江一带受战火威胁，因此牧场业主把奶牛牵到东海滩白龙港老家去避难，直到一九四一年，日军进驻租界，战况暂趋平静。牧场业主重将奶牛牵回原场饲养，恢复生产业务。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但国民党政府投靠美帝，致使美货充斥上海市场，特别是所谓美国救济总署的物资“克宁奶粉”大量倾销，本市鲜牛奶受到沉重打击，郊县牧场业主只得“杀牛、养牛”（杀掉一部份牛换钱来养存下来的牛），真是苦不堪言，幸存者寥寥无几。上海民族工商业者开设的牧场奄奄一息。在各国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而我国刚发展起来的牧场业在萌芽时期就经受了不断的打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们工商业者同样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要实业救国只能梦想。

一九四九年，春雷一声欢庆解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维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贯彻执行扶持工商业发展生产的政策，对牧场业采取积极措施，整顿牧场，核发执照，银行发放生产贷款，税收减征百分之十等等，从而使牧场业逐渐恢复起来。

一九五三年，在洋泾区政府的生建科配合下，在浦东大道六号桥建立了纯种公牛交配站，采用人工授精试验成功，使奶牛品种

不断改良，扩大健康牛群，提高产奶率，同时人民保险公司，接受奶牛保险业务。当时“口蹄疫病”流行，严重影响牛群，各场业主参加奶牛保险后，避免了经济损失。

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鲜奶产量迅速上升，为了解决销路问题，就由国营“益民食品厂”实行包销，这就使牧场业获得稳步而又健康地发展。

一九五六年一月，浦东牧场业共有五十六户，存栏公、母牛共一千零五十四头，都参加了公私合营，成立十一牧场，属上海市牛奶公司领导，徐混涛被安排为十一牧场场长。

川沙的奶牛发展史，现据：抗日时期、解放时期、合营时期的统计列表格如下：

1930年~1956年川沙奶牛发展情况统计表。

年 份	户 数	公母牛 总头数	其中： 产奶牛	日 产 鲜 奶 (斤)	平 均 产 奶 率 (斤)	年 产 鲜 奶 (万吨)	年 产 值 (万元)	从 业 人 员	其 中： 工 人
1938年	14	351	276	2908	10.52	106.10	25.46	84	35
1949年	26	609	488	7047	14.44	257.22	51.73	171	79
1956年	56	1034	844	16164	19.15	304.4	11.68	205	179
56年与 49年相 比增加	115%	73.3%	73.3%	129%	47.1%	129%	129%	7.8%	126%

列表说明：解放后的六年里比解放前的六十一年里，各个项目都有大幅度增加，其中产量和产值都跃升了一、二九倍。

我们的亲身经历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民族工商业者的光明前途。

综上所述，这是一篇川沙的奶牛发展史；也是一篇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的创业史；它由耕牛转化为奶牛，养牛户由半农半商转为专业办场，设备由土到洋逐渐完善。又是一篇爱国主义者与各国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者的斗争史。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火威胁和各国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解放后，我国政府接收了洋商的牧场，扶植改造了旧牧场，从而使奶牛业蓬勃发展。川沙县现有奶牛六千八百头（不包括十一牧场的一千头），已成为奶牛之乡，上海的奶牛冠全国。

随着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奶牛业将有飞跃的发展。忆旧思新，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原工商业者是多么自豪啊！

徐根涛、龙秋涛、杨锡海、
顾炳元、朱瑞康、顾龙根供稿

在上川交通公司的卅年

一、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五〇年期间，上川交通公司（即上川小铁路）由我担任经理。从筹备开始至铁路第一段建成通车以至一再扩建延长路线至川沙县城；几年后再扩建延长路线至川沙县与南汇县边境的江家路车站；通车后不久又与南汇县交通局订约后，进行规划和测量路线、征购土地，并进行桥梁基础的设计至南汇县城和太团镇为止（这个规划，因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浦东而未能实施）。

二、筹备过程：一九二〇年间某著名人士（已记不起他的名字）宣传号召说：“振兴民族经济，必须首先搞好交通运输。也就是说要全国范围内建筑公路通行公共汽车，作为国营铁路的辅助”。我县先进人士黄炎培老先生随即联系地方人士发起上川交通公司，大家认股，我父亲也参加发起人之列认股四分之一（约五万元）；不久适逢当时上海股票市场大跌价，许多认股人即不交股款。筹备工作处于停顿；黄任老在开会时提出要我父亲担任公司经理负责进行筹备工作，我父亲因年迈力衰不能担任，随即由任老提出由我担任经理立即进行测量路线，征购土地，组织施工等工作，黄任老任董事长。原定二十万元的股款，由于各方的交款总共不到十万元，即由我父亲加认股款并垫付部分费用，进行工停。

三、在此期间，先于上川交通公司筹建的沪闵（上海至闵行）及沪太（上海至太仓）的而条公路，先行通车开始营业，不到两年时间，边两条公路都因亏损过大濒临破产，停止通车（原因是其路而是用泥土和小量三和土筑成的，并且车辆载客量小，油耗高，轮胎消费额高，在经济上行不通）。我鉴于这两条公路的先例，并

读到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某英文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论证说：公共汽车在当时情况下，经济上不能与有轨电车（当时租界内的交通客运都用有轨电车的）竞争。果然在不到二年左右，当时由上海美商某公司在租界内运行的公共汽车（虽在租界内马路路面比较坚实，并且由当时的工部局负责维修，不须汽车公司破费——当然执照费是要负担的）也就破产停止营业了。我即向公司董事会建议，上川交通公司的路线改用钢轨小铁路而不能再蹈沪闵、沪太两条公路及租界公共汽车公司的覆辙，得到董事会的同意，上川路在路线测量及土地征购工作完成后即按小铁路的规划进行建设，于一九二四年，第一段路线通车运行。在当时，这条小铁路是国内从事客运的第一条小铁路，也是国内使用内燃机车的第一条小铁路，以及国内使用化学防腐处理枕木和钢筋混凝土枕木的第一条小铁路。

四、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夏：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上川小铁路被日伪霸占，我虽然名义上仍任经理，但不再去浦东公司办事；缩居当时公共租界内，无事可做，我即利用空闲时间再度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于一九四一年夏毕业后在家闲居。

五、一九四四年夏：由于日伪霸占上川小铁路后，连年将客运收益饱入私囊，铁路轨线和机车车辆只用不修，铁路和车辆大都毁损，陷于停顿，日伪没有办法了，就阴谋逼我与日伪合作（美其名曰“日中合资经营”），我得知信息后，决心誓不与敌伪合作，又感觉到当时的公共租界已在日伪占领之中，如不听从他们的摆布必将受迫害生命危险；因此设法用金钱买通伪警局发给我外地经商的通行证，同时将我在上海的户口登记证拍掉以免危及我在上海的家属；得到通行证后，我即沿京沪铁路北上，中途下车，冒险闯过日军封锁线潜往重庆。

六、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立即回到上海，将被霸占的小铁路收回，我仍任经理，将铁路修复重新营运。不久蒋匪发动内战。共产党深得民心，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消灭蒋匪军，势如破竹，上海解放已近在眼前；其时驻在高桥的蒋匪军青年团团团长通知我去该团谈话说：该团粮饷不继要上川公司资助（我体会到这是匪军明知自己的命运朝不保夕，向小铁路勒索），暗示如不满足其要求，必将在逃跑前对铁路进行破坏。我决心不顾从他的威胁，婉言拒绝。果然蒋匪军在逃跑前将上海境内的好多座桥梁炸毁。

七、不久，浦东先于浦西获得解放，我即设法在南市秘密渡江，步行到庆宁寺，获得解放军的允许再沿铁路步行到川沙，沿途看到从庆宁寺到陆行这段桥梁已被蒋匪军青年军在逃跑前炸毁；到川沙县城见到解放军部队的政委，他大力支持小铁路的修复并允许我借用在陆行附近某师范学校拟建校舍的木材和沿线碉堡内的钢板来修复桥梁和机车车辆等。我在公司工人群众的支持下，日以继夜地抢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车，受到军队政委的嘉许，并亲自到庆宁寺来参加通车典礼的剪彩。

八、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向上川公司董事会请假去美国理司尔啊理工学院进修，并在美国和加拿大若干纸厂实习。一九四八年冬，我在国外报刊的报导中分析，体会到蒋匪的末日已将来临，全国即将解放，我即由美国回，向上川公司董事会销假仍任经理。

九、一九五〇年春，蒙中央轻工业部部长（兼副总理）黄炎培函召，去北京中央轻工业部参加工作，任部专员职务，随即辞去上川交通公司经理职务。

十、公私合营：一九五四年我在报上看到上海某私营出租汽车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我即向上川公司董事会提议，经董事会通过，

申請公私合營，蒙市有關部門批准執行。比一九五六年的公私大合營領先兩年。

顧伯威 供稿

一九八五年二月

高桥镇

米行业和米业公会情况

约在一九三〇年左右，高桥地区约有米业十八户，因当时人口少专营米业是不能维持，故兼营杂粮、饲、肥、加工以及收购农村手工业品土布、花边等。因米是主业价格是比较统一的，自动组织三户一组，负责报价（根据信息）。高桥地区运粮船户施云卿有帆船四只，在金山县余来庙开设米行、米厂，运销高桥地区，当时大米是散装，到货后要用斛子计量（不用磅秤，每斛五斗），为达到正确要有公斛进行校对，因此施云卿发起成立公斛处，会同高桥的同业，决定在每运米一石提取若干为基金（船户、米店各半）。先在高桥镇唐家桥口置了基地，建造码头，后再有了基金建造了楼房，名为高桥米业公斛处，立扁为嘉德堂，供神农氏，每年神农氏生日进行校斛，聚餐一次。平时有关统一的事项如运费、上力、价格等进行公议。主要负责人施云卿，雇用文书一人钱鹤新，工务员一人施关荣。

抗日战争期间，产米区粮食不能出境，高桥地区的粮食来源主要是崇明、启东、海门、江阴等地区，从海上运到白沙滩（老海滨），主要品种是玉米、杂粮。浦东地区的杂粮是到高桥来贩运，故在这期间高桥杂粮店开业较多，约有五十家左右。居民用粮是杂粮和米，部份是户口米。这期间度量进行了改革，用斤两来计量，米也改变为每石标准156斤，每斗十五斤六两。加上物价飞涨，一日数价，故用不到公议，公会作用不大（公斛处已改为公会）。施云卿之子施文龙在高桥合伙开设了米店和面粉厂，施云卿病故后，公会主要负责人是施文龙，文书钱鹤新病故